

艺术与思想史丛书

〔英〕罗森◎著

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田汉戏剧艺术论

田汉著



356

12/0.72
L98

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

[英] 罗 森(Jessica Rawson) 著

孙心菲等译

孙 华 韦 正 梅建军 范毓周 审订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093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罗森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7

ISBN 7-301-04737-1

I . 中… II . 罗… III . 艺术史-研究-古代文集 IV . J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341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

著作责任者: 罗 森(Jessica Rawson)著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737-1/C·0199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3334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4.25 印张 40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范毓周

在当今西方汉学界,谈到美术考古问题时,几乎没有不推重罗森(Jessica Rawson)的。她不但学术功底深厚,而且研究领域广泛,举凡青铜器、玉器、陶瓷器和考古学等,几乎均有深入研究,并有多种论著问世。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集,虽然只是她近年来发表的多种论著中部分论文的结集,但从中也可看出她在诸多领域中所具有的高深造诣和独到见解。

罗森多年潜心于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先后出版《中国青铜器:艺术与礼仪》(*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赛克勒收藏的西周青铜礼器》(*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er M. Sackler Collections*)等重要著作,在国际汉学界产生过广泛影响。尤其是《赛克勒收藏的西周青铜礼器》一书,不仅取材丰富、论证博洽,而且内容翔实、体系完整,充分体现了她对中国青铜器理解的深入和研究的缜密。本论集中的一些论文则从一些独特的角度探讨了上述著作中尚未涉及的问题,如《西周青铜冶铸技术的革命及其对各地铸造业的影响》,探讨了青铜器的历史起源问题;《古代中国的青铜礼器——来自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墓葬和窖藏的例证》(*Ancient Chinese Ritual Bronzes: the Evidence from Tombs and Hoards of the Shang(c. 1500-1050 BC)and Western Zhou (c. 1050-771 BC)periods*)则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论证青铜礼器在商周社会的地位与作用;《晚商青铜器设计的意义与目的》(*Late Shang Bronze Design: Meaning and Purpose*)是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探讨了商代后期青铜器器型和纹饰的意义与功能;《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则是透过

器物造型来研究社会形态的佳作;《楚文化对汉代青铜器发展的影响》(Chu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an Bronze Vessels)更把青铜器的研究视野延伸到了汉代。罗森的这些论文充分展示了她作为世界一流的中国青铜器专家的深厚功力和宽阔视野,也是她前述专著补充和拓展。她的学术见解颇具高屋建瓴之势,通常是从小处入手,最终透视并揭示出社会、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变迁。可以相信,不论是一般读者、抑或是专门研究青铜器的学者,都能从这些论著中获得启发和教益。

陶瓷器是罗森研究的另一领域,在这方面她同样卓有建树。《关于唐三彩外销问题的最新研究》(The Export of Tang Sancai Wares: Some Recent Research)是她较早探讨唐三彩外销问题的代表作,其中提出的不少新见,至今仍有价值和意义;《中亚银器及其对中国陶瓷器的影响》(Central Asia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Ceramics)和《中国银器及其对瓷器发展的影响》(Chinese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on Porcelain Development)是通过对不同地域和不同材料的器物进行比较,来探讨中国陶瓷在发展过程中对银器造型纹饰的吸收和利用,其中不乏卓见,使人耳目一新;《成套还是单件使用? 10至14世纪中国瓷器的使用方法》(Sets or Singletons? Uses of Chinese Ceramics: 10th-14th Centuries)一文,则从不同类型的陶瓷和青铜器的角度,探讨了这些器物不同的功能及使用方法。这些论著展示了罗森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不受现有学科分类的局限,善于辨析并捕捉学科间的联系。这样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她的论著常常蹊径独辟,灼见频生。

在玉器研究方面,罗森同样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玉器造型的起源,这在她的《玉器与金器——古代中国玉器造型的起源》(Jade and Gold: Some Sources of Ancient Jade Design)中有很好的论述。由于玉器的不朽特质,许多古玉流传到后代,也因此刺激了后世的仿古,《古代玉器的再使用》(The Reuse of Ancient Jades)则对玉器的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她对器物的观察的精到。她所写的一本关于玉器的重要目录《中国玉器——从史

前到清代》(*Chinese Jade -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1995 年为大英博物馆所出版)对此有更系统的探讨。

罗森还对器物纹饰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收入本书中的《说龙凤》(*The Dragon and the Phoenix*)和《荷与龙——中国古代纹饰的来源》(*The Lotus and the Dragon: Sources of Chinese Ornament*)即其代表。此外,她还结合考古现象对古代中国的思想信仰提出新见,这反映在本书所收的《中国葬礼的类型——思想与信仰的知识来源》(*Chinese Burial Pattern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Thought and Belief*)和《思想与图像的互动——从中国后世观念看墓葬陶俑》(*Thinking in Pictures: Tomb Figures in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After life*)等论文中。本书收录的另外两篇论文《推翻假设重看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Overturning Assumptions: Art and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和《商代中国南方地区与河南的联系》(*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Hena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则是她对中国考古学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她对一些最新考古发现之重大意义的敏锐把握。

我和罗森的交往始于 12 年前。1988 年春,我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讲学,她在百忙之中仍然抽暇聆听我的学术报告,并盛情邀我到她所负责的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讨论中国南方青铜器问题和鉴定馆藏青铜器,之后她又热情借出馆藏著名的《库方》1506《儿氏家谱》甲骨文刻辞供我会同剑桥大学和大英图书馆所藏的相关甲骨文资料作综合研究和鉴定。其待人之诚和对待学术问题的认真态度是令人十分感动的。在我离开伦敦前往巴黎时,她还特意将其新著《中国青铜器:艺术与礼仪》(*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一书送我,并告诉我,她的《赛克勒收藏的西周青铜礼器》很快就要杀青,出版后就寄赠给我。后来果如其言,书在日本刚刚印讫就由印刷厂受其委托径直寄来,足见其一诺千金的学者风范。她在数年前以其在中国美术考古领域的卓著成就荣膺世界著名学府牛津大学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的院长可说是适得其选的。

我早有意向国内学术界介绍罗森的学术成就,但由于诸事冗扰,

一直未能遂愿。不意去冬北京大学出版社谢茂松先生因李师学勤先生之荐邀我編集并组织翻译这本论集,我是十分高兴的。我在李师学勤先生所编目录的基础上,根据论文性质略作调整和增补,组织了南京大学和上海高校的部分学者与研究生焚膏继晷分头翻译,最后由我再做统一审校订正,始成此稿。现在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学者了解国际汉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一些方便。为了便于中国读者了解罗森,写了以上一些话,聊以为序。

2000年1月18日撰于南京大学璞堂

目 录

序.....	1
从欧洲和地中海以西的艺术观点看早期中国的 艺术、考古及中国的统一	1
推翻假设重看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文化	13
商代中国南方地区与河南的联系	28
西周青铜冶铸技术的革命及其对各地铸造业的影响	52
古代中国的青铜礼器——来自商代和西周时期的 墓葬与窖藏的例证	69
晚商青铜器设计的意义与目的	92
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 ——从青铜器看西周	134
楚文化对汉代青铜器发展的影响.....	164
古代玉器的再使用.....	194
玉器与金器——古代中国玉器造型的起源.....	219
中亚银器及其对中国陶瓷器的影响.....	241
中国银器对瓷器发展的影响.....	258
成套还是单件使用——十至十四世纪中国瓷器的 使用方法.....	279
关于唐三彩外销问题的最新研究.....	298
说龙凤.....	322
荷与龙——中国古代纹饰的来源.....	329

中国的丧葬模式——思想与信仰的知识来源·····	348
思想与图像的互动——从中国后世观念看随葬陶俑·····	394
过去在中国的多种含义·····	419

从欧洲和地中海以西的艺术观点 看早期中国的艺术、考古 及中国的统一*

前 言

作为一个欧洲人,我不可避免地以欧洲人的观点来看中国和她的历史。这个方式一方面限制着我,一方面则有助于我对欧洲和亚洲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以这种观点来比较和对照这两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发展的一些要素。但这个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暗示对欧洲人而言似乎是很令人惊讶的中国统一的一些特色。

我将从两个形象开始:秦始皇帝墓前的兵马俑和大英博物馆所藏巴特农神殿(Parthenon)壁缘雕刻。这些举世闻名的雕刻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而且是按照不同的目的制作的。兵马俑纯粹以功用为主,提供来世一支军队,而巴特农神殿游行的行列是用来纪念雅典娜女神(Athena)节日的雕刻。这两个例子是很重要的,不在于形式上的不同,而在于这两件作品所告诉我们它们在文化态度上的不同。

不仅艺术形式,还包括风俗、社会模式和信仰,在这两个地区有显著的不同。事实上,我们绝不能期许这两个地区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品在形式、内容和意义上类似。在欧亚大陆的两端,过去和现在存在两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在东方的中国及受到中国影响的邻近国家,包括韩国、日本及东南亚;而在西方的地中海周围,环绕着曾经繁荣

* 本篇为作者 1998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

一时的古埃及、巴比伦和希腊文化的中东国家。当罗马人建立他们的帝国时,他们选取了许多古典的地中海文化特色,将它们向北和向西传播。在欧洲北方的我们是一个伟大文化传统的幸运后裔,在中国的你们是另一个伟大文化传统的幸运后裔。

举例来说,中国和欧洲的雕刻方式便不相同,我们可以以金和玉这两种珍贵材料为例来说明。在很大的程度上,选择这两种材质在这两个不同地区是很偶然的。在地中海世界东边的人们发现了金和银,将它们锤打制造成精美装饰品以及后来的杯子和器具。在远东,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发现了可以琢磨成具有象征意义物品的精美硬石。起初,或许使用各种不同的矿石,到后来最显著的石头就是软玉。在这两个地区,这些精美的物质被小心翼翼地制造成高价值的器具,且被他们社会中阶级最高的人所拥有。例如我们可以选择金制或银制,作为基督教仪式用的圣餐杯和皇家使用的黄金或鎏金权杖来和中国皇室中玉雕的精美酒杯及许多不同类型的权杖对照。在这两种事例中,权杖和杯子都是最高阶层的人在特殊的场合中所使用的。这些材质当然会给予这些物质有别于一般的、实用性的器具的外观。另外,这两种材质的选择影响了这两个分开的、不同的地区超自然的思想。《圣经》提到天国的城市是金色和光亮的,在中国,道教的天堂被诗人描写为白色和迷蒙的。金和玉,这些物质的特色已并入这些超自然王国的概念。

金和玉这两种材料首先被选为装饰品和器具,后来便成为暗示超自然和天国的方法。光和黄金以及至高无上的神之间的联想关系,在所有欧洲语言中均较为普遍,它们利用像“enlightenment(启蒙)”的词去提及与智力及心灵相关的理解,在这个词中“light(光亮)”和它的概念,不只用来指示物理上的光亮并且用来指示心灵上的光亮。同时在中国对玉的崇拜也已经发展,在《礼记》中,君子的素养依据玉的品质来形容,类似的比喻也出现在早期的《诗经》中。在这两个分开甚远的地方,这些相当不同的物质,有着可以比较的字面上和隐喻性的用法。

罗马和秦帝国

金、玉雕刻和本身贵重的物质,随着罗马和秦帝国的建立,被赋予崇高的地位。

如果我能扼要说明罗马帝国的成就,我将说明它建立了一个具有共同法律、货币和语言的统一的政权,这些也同样存在于秦始皇的帝国。再者,这两个帝国导入了一个横跨广大地域的共用文化。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石头建筑和雕刻,经由希腊、罗马的改造,然后传播至帝国的周围地区,例如法国和英国。在这种方式下,产生了几乎延续到现在的精美的建筑和雕刻的悠久历史。黄金也一样,被所有地区采用为仪式的物品,这些物质和艺术及工艺形式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权力。此外罗马人将种种的意识形态引进到这广大领土的许多部分,包括像尊敬神一样地尊敬帝国的信仰。稍后,信仰耶稣的宗教被传播到这整个地区。这个信仰的系统利用了建筑和雕刻以及黄金装饰、工具和器具的工艺和艺术。

在中国,类似的情况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秦始皇的征伐产生了一个统一的政权,它也一样有着共有的法律、货币和语言。它也一样有着团结的军队以及调动军队和军粮的联络系统。然后从这里开始,其不同将成为本文以下的主要讨论内容。商周时期的玉器和青铜器等精美作品,在此时已被一些新物质,特别是石头所取代,虽然玉器仍然很重要。书写和书法扮演着支配性的媒介角色,意识形态也改变了,儒家的传统现在也伴随着对不同神灵和恶魔的新兴趣而逐渐形成。

在东方和西方,我们目睹了一个平行发展的现象,早期宗教和心灵的价值附加于我们今日所称的“艺术”之上。在东方的书法以及在西方的雕刻已把这些艺术形式置于他们社会中的特权位置。在这两个地区,当一系列的信仰、价值和习俗统一于这两个帝国时,明显的地域性的差别依然保留着。

秦汉时期中国的统一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举例说明秦汉时期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在今天称为中国大陆的广大地区内复杂多样的区域和信仰。最近的考古发现揭示了秦汉时期之前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多数不同的人种和文化。前二三世纪秦的统一以及汉的巩固所带来的一致性叠压遮盖了两个帝国内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

首先,我将略述秦与汉慎重地寻找和统一的,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领土,而且包含他们相信包围他们的整个领土范围的方法。

秦始皇当然是因他统一中国和筑长城为边界而闻名,他也因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货币而著称,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主要竖立在东方的长铭文石刻。他选择石头来铭刻他的成就,刺激了石刻铭文的长久历史,产生了中国书法传统的开端。事实上,这些最早的长石刻铭文和用来表彰罗马帝王和后来欧洲国王的政治性和宗教性雕刻及绘画是一样的。

在这世界的两个部分,统治者都面临着意识形态和习俗的差异。如果我们希望去回顾这些秦汉时期的差异,文献和汉皇族大墓中的随葬品将向我们提供公元前二至一世纪,帝国和宇宙观点的一份完整的报告。虽然秦始皇墓和汉代帝王墓尚未发掘,但是埋在河北、山东、江苏和河南山腰的刘姓皇族墓相继被发掘,这些和《史记》上的文献就是我将要探讨的。

秦始皇所统一的领土是使用汉语的世界,在这之外便是神秘地带,这些地方通常很难被人了解,因为它们不是位于沙漠就是高山或半热带森林。这些艰难的地带,似乎被认为处于秦汉帝国和神灵王国之间。秦汉从战国时期的楚国得到遥远昆仑山的概念。在早期,西王母并未和昆仑山联想在一起,这一概念是后来才发展的。她被认为居住在北方的某处,而蓬莱岛则被认为处于齐国和鲁国东方的海上。

我们从《史记》记载中得知秦始皇和汉武帝特别关注神灵世界。

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生活的记载以及他对于封禅的讨论,给予我们足够的证据说明根据当时的信仰,这两位皇帝致力于驱使所有已知宇宙的神灵来供自己使用:

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59, 1371 页)

在汉武帝把神灵的崇拜并入皇室的礼拜方法中,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封八通鬼道的祭祀(从楚墓中出土的武器得知为太乙帝)。据司马迁所描述,这些神灵除了有特异的力量之外,太乙具有更崇高的身份。司马迁详述了谬忌奉劝武帝祭祀太乙的话: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59, 1386 页)

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影响下,企图驾御宇宙的所有力量,很明显地是这两位皇帝的目标。

他们不仅想要驾御神灵世界的所有力量,秦始皇和这些刘姓皇族还明显地希望在他们墓中仿造宇宙的样子。在此我们必须提到“象”这个概念。因为古代的中国人认为人类的世界是完全仿造宇宙的,所以他们以“神祇具有和皇帝一般的力量且拥有完整的百官制度”的方式来描述神灵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以宇宙的模式来营造他们的墓葬。

这些仿造在墓中的宇宙,显示了这是由许多地方的特色集合在一起,产生的一个理想宇宙的方式。这些皇族的永久宫殿是建筑在小山丘的岩石中,或者埋在人工的土丘下。这些石造的宫殿具有许多不同功用的房间,它们都装饰着描绘宇宙神灵的绘画。这些墓都有一些很平常而又令我们感觉新奇的精美的器具,包括火盆、油灯、香炉,有时甚至是帷帐。偶尔真的奴仆会埋在墓中,但通常都是模型,陶制兵马俑便是其中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墓葬中,宇宙的所有部分都得具有功能性的特色。

现在我将考虑这些主要特色的来源,许多习俗都是来自楚地,备有日常生活器具的多室墓室的使用是楚文化的特色。从曾侯乙墓的

时期开始,南方开始使用分开的、具有不同功能的墓室。从楚墓中也发展出使用对抗恶魔的镇墓兽。在曾侯乙墓中,这些镇墓兽不是画在内棺上手持戟的形象,便是雕刻成具有鹿角的生物。就是因为这种保护的需要,导致陶制兵马俑和汉代皇族墓中小型军队的产生。

事实上,如同一些学者指出,这些兵马俑很可能是用来对抗灵异世界中的军队的。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毕竟屠杀了许多军人,他也许需要一批军队在来世中对抗六国和他们的军队。如我已提及的,我相信兵马俑最重要的前身并不是发现于北方的小型陶俑,而是来自楚国的木俑。这些木俑借着服饰和姿态,表现了他们精确的功能和阶级,这些也是陶俑的特点,我们很容易地了解到其他特色也是来自楚国,南方一直重视音乐,而许多大型汉墓中也都随葬乐器和乐师,虽然通常都是模型。

虽然可以把这些归之于楚的传统的影晌,但无可避免的是它们是在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历史环境背景下发展的。首先,秦始皇征服现今湖北和湖南等地,迫使楚国东移。于是秦接收了这些地方的楚习俗,此后,楚在东方包括安徽和江苏的南部建立了根据地。刘邦来自现今的徐州地区,因此这地方成为刘氏家族的根据地,楚和东方的习俗因而相互接触。

而东方也扮演着主要的角色,选择山作死者的宫殿,把他们摆在神灵住处旁边的想法来自东方。除此之外,东方似乎对玉器特别感兴趣,因此这些诸侯王都随葬玉衣、精美玉佩饰、玉器具及武器。对于玉器的喜好很可能来自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而这些地区则是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的起源地。例如满城的刘胜墓中,玉琮便是玉衣的一部分。战国晚期和汉代一些死者身上盖满一层的玉璧,一些玉衣内也发现有玉璧。整层的玉璧也在良渚文化中被使用,良渚时期墓葬的发掘,可能刺激这种习俗的产生。

其次我们也必须看看其他的特色,中国皇帝把所有他们认为维持他们国家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事情与他们自己关联在一起,把来自西伯利亚的异常特色带到汉的社会。和中亚及西亚的接触几世纪以来都是很重要的事,而且交换物质、材料和习俗的情形仍然继续存

在。例如,似乎至少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许多中亚或西伯利亚的物质已经抵达中国且被仿制。在汉墓中有许多来自内蒙古或甚至南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地区的金饰物品,徐州地区楚王墓中出土的黄金皮带扣饰和来自鄂尔多斯(Ordos)地区的很类似,且两者均仿制来自南西伯利亚的木牌饰(图1)。

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上所述,对石头的一般兴趣。很有可能这是发展于汉代的,因为他们已经听过远在北方的奇怪墓中尸体被永久的保存。这些传闻也许来自阿尔泰山地区(在那里墓和尸体被永久冻土保存着),如我们所知,那儿与南西伯利亚有接触。但关于使用石头的原始思想则来自西亚。使用于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动物主题也是基于来自更西的雕像,如来自伊朗和更远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些主要的纹饰包括狮子,特别是狮子头像,打斗的动物如猫样的动物攻击鹿或野猪,有翅膀的动物和骆驼。

所有这些生物都被刻画在西汉精美青铜器上,其中最壮观的一件是从河北刘姓皇族墓中出土的铜车马镶嵌器(图2)。这件铜饰上的图案几乎是描写在赋(发展于南方的诗歌形式)中神奇景观的图像。

其山则盘纡崑郁,隆崇嶒峯;岑峯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北则有阴林巨树,……其上则有鸛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1959,卷七《子虚赋》)

铜管上的景观充满了不寻常的现象,包括有翅膀的马和至少两则老虎攻击野兽的例子,其他鹿、熊和鸟也都是显著的例子。此外,最精美的例子是一条龙、一个反身骑在马背上的射手,后半部是一匹马、一只象、骆驼和一只孔雀。这些生物许多不是具有异国的联想,便是实际上从西方选择的题材。这些相斗的动物、鹿和飞马等题材都曾发现于鄂尔多斯(Ordos)地区、南西伯利亚、伊朗及美索不达米亚。反身的射手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设计,此例也发现于中亚奥克苏斯(Oxus)地区精美的象牙上(图3a)。熊虽然是汉代不寻常的发明,然而这些熊却到处可见。在汉代早期的艺术品上,这些生物可能改